

犬田卯的农民文学与日本近代化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王 硕

[摘要] 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农民文学从独特的视角审视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变,却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犬田卯的农民文学突破了既定的“田园文学”范式,在历史的维度下运用现实主义手法,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得以重现,撕下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光鲜外衣,让隐藏于近代化表象下的城乡对立暴露出来。作家犬田卯认为,城乡巨大差异下的农村无法实现健康发展,日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制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农民始终难以确立自我意识。作家试图以文学为手段,重构农村文化。本文以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为支撑,考察犬田农民文学思想的合理内核,对体现其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农村传统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度剖析,阐明了导致城乡分化的双重因素,揭露了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积弊。

[关键词] 犬田卯 农民文学 农村 都市 近代化

明治时期,日本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近一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生产方式的变革重新定义了都市与农村的社会地位,资本主义的盛行淹没了农村的应有价值,从经济层面开始,城乡之间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被逐步拉大。至大正时期,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思潮论争中发展的日本文坛,始终浸染于资本主义底色,从创作主体到作品内容,其出发点始终是“都市”。虽然明治末期已有国木田独步等人涉足农村题材,但本质上不过是都市人进行乡愁表达、向往农村聊慰身心的“田园文学”或“乡土文学”,即便后面出现了《土》(长塚节,1910)这种揭露农村现实的作品,但出身豪农的他与底层农民之间始终横亘着无形的隔断的空间,难以真正感同身受。在被忽视的角落中,犬田卯(1891-1957)另辟蹊径,从1919年开始到1956年前后,发表了近百篇小说、随笔、评论及译著,书写、揭露农村真实。犬田文学的问题意识辐射多维向度,涵盖农村经济结构演进、政治发展路径、传统思想与文化教育转型、农民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关系等诸多方面,其中,城乡分化问题是他关注的重点之一。作家基于自身佃农的经历,以现实主义写作手法高度还原了彼时日本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态,表现了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下农村与都市的冲突,揭露了日本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积弊。在此,姑且将犬田的这类作品称作犬田卯的农民文学^[1]。

关于犬田卯的农民文学,国内目前尚未发现研究成果,日本方面则可列举一二。安藤义道在《犬田卯的思想和文学:日本农民文学的光芒》(1979)中,对犬田卯的农民自治主义主张和农民文学活动进行了讨论,并重点谈到了犬田的农村教育理念。内藤由直在《第五阶级的文学——犬田卯的农民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论》(2009)中将犬田卯的农民文学思想置于农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论争的大背景中考察,探讨了犬田文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船户修一则在《农民文学和其社会构想——农民文学者犬田卯的农本思想》(2004)中,结合时代背景,从“土的艺术”“反都市意识形态”“农民自治主义”等方面探讨了犬田的农本思想。

这些研究为理解犬田的农民文学提供了各自不同的视角,但过往的研究更多是关注作家的农民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即从文学外部对作家的农本思想进行考察。实际上,作为日本近代农民文学运动的主要发

起人和代表作家,其文学文本(如小说、随笔)内部的思想表达更值得推敲。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作品当中所表现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政治、文化冲突,是贯穿犬田文学根底的逻辑所在,更是日本资本主义起步与发展的缩影。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之下,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如何?彼时“脱亚入欧”的光鲜亮丽背后又有怎样的难言之隐?城乡分化出现的根源又在哪?一心向往实现近代化、成为“文明国”的日本,是否真的脱离了“野蛮”?本文将从犬田农民文学文本出发,以唯物史观视角尝试对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的真实情况进行审视和剖析,以期对其进行新的思考与解释。

1 犬田卯农民文学中的城乡分化:生产方式作用下的近代化表象

犬田卯出生于茨城县牛久沼的贫苦佃农家庭,是日本近代农民文学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在日本近代化发展的汹涌浪潮中,面对都市与农村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犬田卯以文学书写再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农村地区的生活景象,并以此种“低贱、落后”的农村为坐标轴,将都市置于与农村对立的维度中去表现。他曾表示:“不如说是加工生产被都市独占导致如今农村生产劳动的迟滞。如果农村也有工厂、车间,可以操纵机械的话,一定可以做到更尽善尽美的加工,实现科学生产。……当然资本主义越发达,都市对农村的问题就越严峻”。(犬田卯,1929:64-65)犬田清醒洞察到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城乡矛盾,同时对农村未来抱持着审慎乐观态度。然而其作品既未对物质生产资料匮乏的农村进行浪漫化空谈,亦未对高歌猛进的都市资本主义展开的情绪化批判。而是以一种“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使个人倾向让步于对现实的描写,如实地提供了一部日本产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下的农村的现实主义历史。他一边是农村、农民利益的争取者,一边又如实地再现了农村的丑陋与落后。当批判与自我批判共存时,作品中暗藏的嘲讽与抨击便更加犀利、汹涌。

在部分作品的开篇部分,作家便多以写实的环境描写为引子。比如:“在池沼的对面太阳沉了下去。夕阳的颜色逐渐褪去,东风稍有寒意,广阔的池沼表面泛起琥珀色的粼粼波纹。围着岸边一直延伸到远处的芦苇丛,开始骚动作响,寂寥蛙声一二”(犬田卯,1985:234)^[2]。春天一般被冠以“生机盎然”等充满生命力的形容,但作家选取的是日落时分,且没有刻意营造“听取蛙声一片”般的热闹,只是如实地记录了寻常一天的必经时段。“包裹着田野的乳白色朝靄渐渐变成淡紫色,今天也是一样,那毒血一样的太阳又燃烧了起来”(犬田卯,1985:211)^[3]。夏天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但作家并没有去歌颂阳光、生命,而是甚至用“毒血”来表现烈日中天的场景。“站在关东平原的主要部分——常陆(今茨城县东北部·笔者注)南部的耕地一角眺望弯弯曲曲的怪异山体时,会感受到一种威胁”(犬田卯,1985:247)^[4]。这是秋收前的一次场景描写,感到“威胁”是怕霜冻会影响收成,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收割。作家以字里行间的微妙用词来隐隐传达出对彼时农村生存环境的感受——缺乏生命力与能动性。这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012:579)的现实主义倾向性,而这种不以自我意识为转移的现实主义倾向的直接来源正是难以逾越的城乡差异。

自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以后,为完全摆脱封建束缚,新政府对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竭力为资本主义的引进与发展扫清障碍。政治上,大力改革行政区划,实行“废藩置县”,随后效法德国,确立了专制主义君主立宪制,直到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日本帝国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经济上,明治政府一方面大力推进“殖产兴业”政策,引入大机器生产,兴办官民企业,鼓励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进行地税改革,允许土地买卖,将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5],加速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社会文化上,提倡“四民平等”,基本实现了职业选择自由、迁移与运输自由等。此后,随着日本财政、金融体系的完善,企业发展的资金供给、筹措得到保障。同时努力提高贸易话语权,逐渐扭转入超局面,产业革命逐渐走上正轨。然而,“近

代化”的红利并没有真正辐射到农村,农村社会在整个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最下位,或者说是几乎被忽视的程度。犬田在长篇小说《隐于土》^[6]中对此作了如下表述:

在东京,大家都打扮的光鲜亮丽,每天来去匆匆。他们的身上不会沾染泥土,也不会触碰肮脏的东西。每天早上睡到日上三竿,每晚灯红酒绿到夜半十二点。话虽如此,倒也并非我自己一定想做这些事……

他们晨起沐浴,干净整洁,谈笑间便赚到了钱,空闲时候像话剧、活动、曲艺杂技、台球、酒、女人、山珍海味,只要想要就会有。同样,这也绝非是我想做的……

总之,他们生来就被赋予王者的特权。农民的孩子一落地便被带到了田野,被放在水旱田的边缘、林地的草上睡着,不管怎么哭闹、叫喊,忙起来也顾不上理会。回到家后被跳蚤和蚊子缠绕,只有因营养不良而干瘪的乳房为食。穿着破烂的衣服,即使沾满泥土和汗渍也无法清洗。就算是猫狗的幼崽也会被更疼爱一些吧。甚至与一只虫——蚕等相比,也没啥可比性。

如此,都市里的孩子是怎样的呢?经产婆的手一来到这世上,便被绢布包裹起来,被安置在松软的褥子上入睡,紧贴着浓郁的乳汁,稍微一哭便被抱起来,要是有点发热便会叫来医生,竭尽人的智慧来悉心哺育。我们田野中的孩子,就算烧到不省人事也不会考虑看医生。

(犬田卯,1935:338-339)

这是第三视角的内心独白,城乡间的天壤之别从生命之初便可见端倪。从“悉心哺育”与“随意放养”到“光鲜亮丽”与“满身泥土”,构建起一种从起点到终局都难以跨越的身份界限,城市与乡村的对比反差俯拾即是。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与资本主义风气的盛行,在东京各种摩天大楼(第一国立银行等)拔地而起,西餐厅、“鹿鸣馆”、咖啡馆、电影院依次出现,上流人士穿梭于各种社交场所,人力车、欧式马车等新式交通工具也开始流行。但正如木户孝允所言,这只是“日本桥附近的文明开化”(田中彰,1974:102),都市越是如此,农村与其的差距便越大。从作家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农村与都市的生活状态天差地别,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从出生起就被命定。在日本近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看似高速前进的经济表象之下,实则暗藏农村与都市发展失衡的真相。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加快,到日本产业革命时期逐渐形成了农村和都市两极分化的局面。犬田表示“这种不同越来越明显。一方面都市人沐浴着文明的恩泽,另一方面农村人被与所有的文明断绝,变成为都市人生活舒适而进行物质生产的奴隶”(犬田卯,1935:340)。恩格斯强调:“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654-655)。这种城乡社会阶层的分裂,不是凭空产生、自然发展的,是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中,伴随一系列生产方式的改变逐渐形成的。这便是作家现实主义倾向的根本。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是恩格斯强调的一种“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因素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种历史现象,而是在其他因素间接性作用的情况下表现出来。

日本产业革命发展时期,经历了“三次高潮”与“三次危机”,但整体来说日本经济取得了显著发展。宏观经济层面,“25年间(1886-1910·笔者注)国民总生产由8.06亿日元增长到39.25亿日元,增加4.9倍。人均产值由21日元增长到79日元(当时的日元与美元比价大致为1:1),增长3.8倍”(杨栋梁,2010:75)。具体到各产业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截至1910年“农业产值的比重变成32.5%,降低近13个百分点,工业产值增长了8.6倍,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则由11.5%提升到21.5%,增加10个百分点,非农林水产业的产值已经达到67.5%,表明1910年前后的日本已经初步成为工业化国家”(杨栋梁,2010:76)。但日本“工商业的发达,很多时候是由于在政府的工商立国政策之下,依靠国家直接或间接的保护,农业负担了大部分的牺牲”(高桥龟吉,1930:33)。

首先,从国家(外部)层面来看,最初1873年地税改革实行时,国家财政“年入是85,000,000日元,而年出是62,000,000日元,租税增加到65,000,000日元,年出的全部,已可以靠租税解决。租税中,有60,000,000日元是地租。如果考虑到当时政府在振兴产业和对外活动中所需的经费,都是依靠地租收入这一事实,那么就会了解到地租改革对国家财政的意义,怎么夸大也不算过份”(坂本太郎,1992:413)。而地租的主要承担者便是农民,直到日俄战争前后农村承担赋税的传统仍在延续。犬田在《隐于土》中写道:“农民们还要承担战时(甲午海战、日俄战争·笔者注)税。庆功会、纪念碑这类的东西也要负担很多”(犬田卯,1935:182)。可见,就连战争的推进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农村的牺牲。然而战争结束后,农村不仅被排除在利益团体之外,还要继续承担战后庆功会、纪念碑建造等无意义活动的款项支出。对此,高桥龟吉的学术著述可以作为佐证:“农村被附加的帝国主义活动的必要的租税和兵役负担加重;对工商业的保护以及补助费都由农村负担;在税制上是都市偏轻,农村偏重”……“在金融制度上偏重工商业,导致农业资金枯竭”(高桥龟吉,1930:33-34)。也就是说,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后来回归到正常的经济发展轨道,日本政府始终以农村为工商业的“牺牲品”,不仅忽视对农村建设的资金供给,还不断从中榨取税收,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其次,从农村内部来看,地税改革时期建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到明治后期逐渐发展为寄生地主制,地主资金出现了资本化倾向。1890年代土地价格大幅上涨加速了土地兼并的发展,“不在村地主”将所有土地进行外包,“只关心作为商品购入的土地的收益,对于租地费减免的请求置若罔闻”(晖峻众三,1988:92)。“至明治40年代,佃耕土地则发展至耕地面积的近一半,……佃农按收成的一定比率交纳实物佃租(大米),但租额极高,在明治末期,佃租额竟超过收成的一半”(周启乾,2019:224)。

对于佃租额居高不下的情况,作家在中篇小说《被解放的农奴》中,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25俵左右的米被堆在了房间里。那里面能合格的应该只有20俵左右。他在用簸箕筛碎米时,不由自主地想着——上交完年贡只能剩下两三俵了吧!半次从‘塚’(地主·笔者注)那里拿来的账单中写着要上交30多俵。这是几年时间里多借的租费(米),还有早秋时早稻还没有成熟之前借的半俵、一俵的总和。但是按照习惯,虽说是30俵,但只要拿出20俵米,那时就能应付过去了。到了秋天就尽量缴足,不够的部分再借来补上……这是像他那样的佃农和地主之间的惯例。当然,总所周知,一旦把东西缴进了地主的仓房,再要想借出来的话,一俵的利息是一斗/年。

定作像命令自己似的说道:“诶呀,快把20俵都交够!今年好歹是个正常产量!”

啊!20俵,这可大约占他今年总收成的一半。等不及早稻成熟便吃掉了。再把经常向邻居借来的米还掉,也就不剩啥了。所以说留下过年的部分,除去作为租费的米,只剩下5俵不合格的了。(犬田卯,1985:278-279)

在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佃农已经成为了上交粮食的机器。这种“农民劳动”并不能把它单纯视为物质资料生产的必要劳动,农民在这部分时间所创造出的价值的一半被地主占有,且剩余部分难以支撑农民进行再生产。同时,如文中表述,如果向地主借粮,“一俵的利息是一斗/年”。4斗为1俵,借贷年利率高达25%。地主通过这种高压模式不断掠夺农民的剩余劳动甚至是必要劳动的一部分。在此期间,伴随生产成本的提高,佃农的生活更加不易,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都市,成为廉价劳动力。“据统计,至明治36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明治二十年的71.01%下降到64.07%,大正元年为57.72%”(高桥龟吉,1929:582)。如此,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土地价格大幅回落。而此时恰逢日俄战争战费调配的紧要关头,日本政府“稳定或免征国债利息税,对银行储蓄、公司债、贷款等收益税同样维稳”(晖峻众三,1988:96)。因此,地主的资金较大程度流入上述领域,不仅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更是间接进行了工业投资,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一来,“内忧外患”的农业经济发展趋于停滞。

在日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跳跃式发展过程中,交换经济的极度扩张彻底打破了农村“自给自足”的局面。在生产方式改变的过程中,伴随着战争的扫尾(西南战争)与推进(甲午、日俄战争),以及国家层面的“重工商主义”政策的推行到农村内部地主资本化的演进,农村逐渐沦为都市的附属品。都市高度繁荣与农村深度贫穷的巨大差异引发了“文明都市”与“野蛮农村”的强烈对立。对此,犬田卯站在农民立场,以现实主义笔触高度还原了这种对立状态,为我们看清对立背后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提供了有效文本。在这一部分,作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下的城乡分化表象为着眼点,通过对农村自然、农民生活与农事细节的描写,自然流淌出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在阻碍日本近代化进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外在因素的背后,另一种不断牵制着日本近代化进程的隐形力量——难以剥离的传统意识形态也逐渐显露出来。

2 犬田卯农民文学中的“土地”与“家”:传统意识形态对近代化的反噬

农村与都市的高度分化,不可否认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催生了新的都市形态,在一系列“重工商”政策的打压下,农村的生命力逐渐萎缩。但农村难以“文明”的原因绝不仅于此。一直内化于农村社会、农民意识中的“传统思想”,在无形之中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历史的客体作为社会中的客观存在,总是制约甚至决定着历史主体及其活动”(李秀林等,1993:338)。也就是说,不论彼时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多么火热,从其发展机制的内部来看,始终摆脱不了历史的基础——受制于封建时期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而曾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封建时期的社会意识,是难以在短时间内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改变,尤其是对于生产力依旧大幅落后的农村,其带有的“滞后性”便更加明显。这种“传统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存在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更是不可忽视的。

2.1 农民与土地的病态关系:“锁国性”的桎梏

犬田笔下的“农民”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封闭性”。这种“自我封闭性”主要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即在所谓的传统观念支配下,农民完全将自己的价值依附于土地,不是人作为劳动者来改造自然(土地),而是人被异化为土地的附庸,缺少了改造自然(土地)的主观能动性,进行一种机械化的作业。

阿民(主人公良一的母亲·笔者注)一边割着麦垄,一边对十吉(良一的父亲·笔者注)搭话:“路上遇到别人……要是被问到良一在干什么,该怎么说呢……”

……

她又补充道:“唉,他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俺啊,一点儿也搞不懂。”

十吉什么也没回答。他用右脚利落地刮掉铁锹上的泥土,马上又朝自己面前挖下去,接着刨向下一垄地。

阿民觉得没趣,嘴边闪过一丝落寞的笑,自己也猛地调换了握锹把的手,跟着刨了起来。阿敏也刨了过去。到了地垄尽头,十吉在那等着跟在后面刨土的两人。阿民喘着粗气,麻利地刨完最后几下,又说道:

“这么忙的时候……居然天天都不干活,光知道瞎玩……俺真是搞不懂!”

“种地这活儿蠢透了……所以哥哥不干呗!”追上来的阿敏用轻快的语调插嘴道。

“生来就是庄稼人,却说不种地,哪有这种事儿,真是的!”阿民回应道。

这句脱口而出的话,让她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她放声大笑,直到心情都畅快了起来。

然而,这笑声反倒让十吉感到不快。说这些轻佻的、不着边际的话,又有什么用呢。

他烦躁了起来。收拾好刨了一半的垄地,就走到十垄地开外的地方,独自一人用尽全力刨了起来。

(犬田卯,1926:21-23)

良一不做农活这一行为在家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阿民作为话题的提出者,先表达不满,再拿出“宿命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脱口而出”表明农民就是为了种地而生的这种思想已经深嵌于其精神肌理,而紧接着的“放声大笑”,则是一种带有戏谑色彩的笑,侧面表现出阿民的这种思维方式是被动的、机械的。面对土地,十吉早已成为一个耕种的机器。听到阿民的笑声后,他更加烦躁了起来。这种烦躁是由于根植于他心中的传统意识受到了来自“人性”的挑衅。而阿敏的那句“种地蠢透了”看似为良一辩解,实则也表露了自己的心声。这里,耕种俨然成为了一种强制劳动,完全不是唯物史观视角下推动社会进步的人类创造性劳动。土地凌驾于人之上,农民面对土地没有选择的权利,某种意义上土地甚至支配了人与人的关系。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农民劳动(耕种),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现实关系和客观过程”(李秀林等,1993:380)。自然界为人类的物质需要提供来源,在人类通过创造性劳动来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生产力随之形成。同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外,还存在人与人的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经济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组成上层建筑”(李秀林等,1993:38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又由一定的生产力所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形态演变的根本动力。但不可忽视的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以至生产力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四面环海的岛国地理环境使得日本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较强封闭性的性格特点,“若要走出国境之外就必须抱定决心,只要身处日本便不用害怕会突然遭到外国人的攻击。这是日本人的一般体验且心照不宣的前提之一。”(鹤见俊辅,2019:22)鹤见俊辅将日本人的这种思考方式的特点称为“锁国性”。从字面意思理解,即是固步自封,不与外界往来。这种特性植根于土地,同时也将日本人牢牢困于土地。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产业革命前,农业在日本国家经济结构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德川幕府自1633年起连续发布“锁国令”来禁止国民与海外往来,阻断基督教的传播,稳固了中央集权下的土地制度,形成了强有力的幕藩体制。但在岛原·天草起义(1637-1638)中,当地的农民军联合基督徒与超12万的幕藩军进行了长达近半年的殊死搏斗,幕藩体制备受撼动。对此,幕府进一步强化禁教政策,于1639年发布了第五次锁国令,锁国体制基本确立。“锁国=禁止基督徒,剥夺的不仅是外交、贸易的自由,还有思想、信教的自由,将人民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暉峻衆三,1988:5-6)。在这种“真空地带”中,为了将农民持续束缚在土地上,在官方1643年3月颁布的《关于各地处置措施之公文》中出现了“严禁进行田地之永久性买卖”(司法省调查课,1932-1934:267)的规定,同月在《关于堤防修缮及其他地方事务处理方式之公文》中明确了禁令内容:“产丰之民,购田置地而益富;产乏之民,沽卖田产而益贫。故,自今而后,田畑永代买卖当禁”(司法省调查课,1932-1934:215)这是日本近世时期首次以法令的形式对土地移动进行限制,以政治手段强制冻结土地流通,避免土地兼并和破产等情况的出现,防止承担赋役的农民阶层发生分化与解体。而后从1673年开始陆续出台了有关“分地限制”的法令,如:“不允许将一町十石乃至二町二十石以下的持高(持有量·笔者注)进行分割”(北岛正元,2019:102)。其目的在于防止因放任田地分配造成的小农经营日益零碎化直至破产、从而加速阶层分化情况的出现。而这一系列土地政策的出台,均是为了维护所谓的“幕藩统治”秩序,将农民进行“物化”——变成纳粮的装置,不再具备完整的独立人格(北岛正元,2019:102-104)^[7]。可以说,在日本人与土地关系密切的传统之上,江户时期农民与土地的紧密关系已经近乎病态。

在历史传统与国家政策的双重压制下,农民的意识形态层面出现了严重的滞后性而难以引导其进行创造性劳动。如此,生产力水平难以提高,经济基础无法夯实,社会发展亦难以推进。如犬田文中描述的那样,彼时日本的农民与土地之间不再是原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封建“政治、思想关系”的灌输下,农民

已经无法对土地进行创造性改造。这里的“土地”，不仅是现实耕种的土地，更指向对过往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将所谓的“传统”视为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门，而不去思考其存在的合理性。

小说中写道，回到家后，十吉和阿民继续针对良一“不做农活事件”展开对话。

“人活50年就是这么回事。20岁之前被父母照顾，一直工作到近50岁，那之后就成为了孩子的麻烦，这都是天注定的。”……

良一的全身都在颤抖。(他心想道)天决定什么的，才没有那种荒谬的事，不过是为了方便自己的利己主义罢了。还有要制约他人什么的，……他怒火中烧，难以忍受，像以往遇到这种情况那样，他蹑手蹑脚地从南边的橡树林溜出家门，向着沼泽岸边走下去。……芦苇中、水田中、还有围绕岸边的旱田中，波涛般的声响无处不在。

这是何等的祥和安宁、昭示着永恒的光景。而对良一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感受。在他的家里——那个弥漫着腐朽的、守旧的空气的家，和这沼泽的自然景象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犬田卯，1926:26-27)

在良一看来，可怕的不是“农活”本身，而是将人禁锢住的传统思维方式。因此，厌恶农活的良一反抗的不是“耕种”这一人类劳动，而是将农民牢牢禁锢住的“腐朽”“守旧”的传统思想。其家人或许也并非因真的热爱劳作而劳作，他们的思维早已被这种病态的土地关系模式化，认为一切都是上天提前预定好的，主动将自己投入远离“文明”的泥沼之中。哪怕后来在十九世纪末期寄生地主制的控制下，佃农要上交收获量一半的粮食作为“租地费”，他们也很难去思考为何要上交，只管一味耕种——收获——交粮，陷入了一种机械作业的反复中。这种思维方式的长期存在，使农民陷入认知闭环，失去了对土地的想象力，完全沦为了土地的奴隶。

在这种情况下，犬田提出了“土的艺术”的观点，“土之艺术即使在形式上，也必须打破一切陈旧的表现形式，以如同大地本身般浑厚磅礴、自由奔放且常新的鲜活形式来表现。至于这新形式该称作什么，暂且不必理会，我们首先要将其付诸实践”(犬田卯，1929:9)。在犬田看来，大地本身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他期待着从大地中汲取力量，打破过去腐朽陈旧的思想束缚，使“土地”为农民所用，在大地之上创造新的文化，并以此与过去的“传统”思想进行对抗，试图唤醒这些被重压、支配、“被世风淹没、混同，与其同流合污被裹挟前行的农民们”(犬田卯，1929:10)。犬田的农民文学思想正是要通过引导农民重新认识“土地”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农民学会“实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改造客观世界，以此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变革。

随着日本国家形态的演变，中央集权逐步深化，这种国民根性与封建专制交相呼应，极大程度压制了农民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动力。在“土地”与“农民”的病态关系中，农民深陷“土地”之囹圄而难以自拔，始终无法发挥自我意识，只能以“被压迫者”的身份苟延度日。表面上看，“农民”与“土地”在国家的暴力制度下，为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从背后的意识形态层面来看，日本“农民”与“土地”之间则难以持续推动资本主义近代化，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发展。

2.2 父权压迫与子辈反叛：“家”制度的掣肘

绵延千年的传统国土(土地)观念，早已经内化于日本国民尤其是农民的意识形态中。在自我封闭的日本国土中，约73%为山地丘陵，土地分散，生产力水平低下，小农生产模式成为主流。家庭、村落内的协同作业将整个农村生态系统进行串联，形成了一套“自我完结”式的生产体系。于是，“家”的地位与作用开始逐渐显现。而为了使“家”得以高效运转，其内部产生了盘根错节的力量关系。这种力量关系逐渐演化成为一种观念体系，将家内成员完全镶嵌于一套固定的内在逻辑和结构当中。犬田作品的另一大特点便是充分展现

了“家”的复杂与矛盾。这种复杂与矛盾通过父亲/丈夫与儿子/妻子等人际的纵向支配关系加以呈现。这种支配关系,正是明治时期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制度的体现,也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阻力。

在长篇小说《生于土》中,良一看起来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农民、反抗腐朽传统的“进步青年”。在面对他人“赶紧结婚、种地”的催促时,常不以为然。这对于父亲十吉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这不,就在此刻,那桩反复折腾过三四次却始终无果的相亲旧话,又重重地压在了他头顶上。

当众被唤至人前,再一次听闻那番责问时,他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感到了胸口骤然收紧般的痛苦。最终只是痛苦地眉头紧锁,连辩驳的力气都消散殆尽。

父亲低头不语,母亲和族中长辈们也随之默不作声。众人各自陷入幽深的思绪里。

父亲十吉从良一平日的行事习惯揣度,已隐约料到他在盘算什么。倘若这揣测属实——对他自己、对整个家而言,都将是极大的祸患,不,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大逆不道。

“你以为光自己过得好就万事大吉了?”他刻意避开良一的视线说道:“这可是关乎家的大事”。

话音里透露出一种压迫:这并非是为你个人随意制定的歪理,这是你必须遵守的世间真理。

“可是……”良一敏锐地感受到这股压迫,抑制不住的抗拒之感骤然上涌。他猛然抬头想要争辩,却在撞见父亲眼中迸射的厉光时慌忙躲闪,“我寻思着要是自己都过不好,到头来父亲您说的这个家,怕是也好不到哪儿去。”

父亲闻言沉默。他凝视着膝头方向,面色凝重落入深思。

(犬田卯,1926:4-5)

根据小说后文的描写,可以得知良一并非不想结婚,自己早也有了心仪的女子。他的抵抗是来自于对父亲权威的挑战,以及对家族传统的逃离。从父亲“对整个家族而言,都将是极其严重的祸患”“这可是关乎家的大事”等表述可以发现,这种“父亲的权威”是依托于“家”制度而生的。十吉对良一所进行的压制,一方面是父亲的权威——父权家长制(李卓,2004:349)^[8]的表象展现。江户时代的农村中,“一家之长有权惩戒子女,可以与其断绝关系、将其扫地出门,对子女的婚姻等日常生活也可进行诸多干涉”(北岛正元,2019:109)。这种家长对子女婚姻生活等的控制在明治民法中得到了延续:“家族成员的婚姻和收养事宜,要得到户主(李卓,2004:125)^[9]的同意。如果违反规定,进行结婚和收养行为,户主有权在其结婚和收养的一年之内使其离籍并拒绝复籍”(明治三十一年民法,1976:241)。另一方面更是父亲以“父权家长制”为手段,维系“家”制度延续的深层表露。从根本上来说“‘父亲的权威实际在于家长的权威,而非父亲本身’,家长权不过‘是指一个人处于家长地位时所持有的权威’”(李卓,2004:360),换言之,“家制度”是“父权家长制”的前提。日本社会学家川岛武宜将“家族制度定义为‘家的父家长制’”(川岛武宜,1983:202)也证实了这一点。由此,“父权”以“家长权”为依托,“家长权”凭“家长地位”加以呈现,而“家长地位”又必须要在“家”中得以存在。同时,“父权家长制统治是家制度的根本内容之一”(李卓,2004:350)。可见“父权”的释放与“家”的存在是相互依存、互为必要条件的关系。所以,父亲十吉对良一进行支配的根本目的并非是从“亲子”关系视角考虑儿子未来的生活状态,即单纯地让他“娶妻生子”,而是从确保农民身份的继承出发,维系“家”制度的平稳运行,以谋求“家”的永续发展。

同时,十吉的愤怒也不单是因为十吉不谈婚事,更是因为他忤逆了“传统”,试图挣脱出自己的掌控。

“什么!老子怎么可能向现在这些半吊子低头?”他言辞激烈地说道。“听着!任凭怎样,我也不会做出让人戳脊梁骨的事情。时代算什么?人有人应尽的本分,有必须履行的义务!听着!再怎么说道时代潮流,就能为所欲为了吗?听着!就算时代变了,人的本分也绝不会变!”

(犬田卯,1926:64)

十吉激烈的言辞中,迸发着对传统思想的固守,与对“离经叛道”者的抨击。他一直很恐惧家人脱离自己的权力范围。比如在谈到子女教育时,他表示:“做农民不需要学问,能写个信什么的就足够了。马马虎虎学点东西就自以为是,要么怠慢工作(种地·笔者注),要么不听父母的话,没什么好结果”(犬田卯,1926:12)。未开化才会顺从,哪怕这对子女本身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却是最直接有效的管理方法。良一总是想着要“逃离这个家”,表达出:“就算一时被称为不孝者,也必须要尽力去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犬田卯,1926:68)这样的理想信念。他也试图规劝“阿敏”一起离开,但最后只有他一个人离开了“家”,剩下的人们继续生活在与“文明”隔绝的传统迷梦之中,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寄托在逐渐衰败的传统体系内。在近代化发展的历史语境下,作家通过父子间的暴力摩擦,将明治时期“家”制度的不合时宜性展露无遗。

作家通过对“农民与土地的病态关系”以及“家制度对子女的禁锢”的描写,将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迫、难以进步的农村传统意识形态——以“地”为牢、以“家”为纲——难以推动经济发展的消极反作用揭露了出来。这便是作家笔下的“自我批判”,以此,将阻碍日本近代化发展的内在因素作以呈现。

在都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专横压迫与农村落后传统意识形态掣肘的表里夹击之下,不单是一个、一个“家”的没落,更是整个农村的迟滞,以致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的不彻底性。这提示我们要对日本近代化进行重新审视,包括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思想造势与政治鼓吹是真如其所言,抑或是对历史的忽视与歪曲。对此,笔者将在后文中以《脱亚论》和《劝学篇》中的观点为例,加以说明。

3 何以近代化:日本“脱亚入欧”的名与实

在1875年发表的《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提出了“西方=文明,东方=野蛮”的框架,为“脱亚”奠定了理论基础。十年后,在日本产业革命发端之际,1885年福泽谕吉又发表了《脱亚论》一文,从意识形态层面为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寻找到了所谓合理化出口。通篇以“不可与愚昧中韩为伍,当与西方文明国共进退”为主要思想,称“中韩”为“恶友”,将日本手动划归到“文明国”的行列,并表示:“我日本的国土虽然地处亚洲东部,但国民精神早已脱离了亚洲的顽固丑陋,向西方文明完成了移植”(富田正文等,1981:222)。

按照福泽谕吉的观点,他认为,在明治中期,日本人就已经完成了意识形态上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变。这可以理解为是福泽谕吉基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势头正盛而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可否认,都市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然而在工业化的推进、摩登都市的建造、生活方式的西化这些表面繁荣的背后,被当做“税收机器”与“原料产地”的农村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牺牲品,无法参与到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去。这也使得农村经济无法如都市般发展,城乡分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经济水平的巨大差异下,都市被标榜为“文明”的象征,农村也就被置于远离文明的角落而无法自拔。“野蛮”的农村长期受困于传统的意识形态中,这种落后的社会意识对农村乃至整个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反作用。这种未开化的“国民精神”何以被称为“向西方文明完成了移植”?

更进一步来看,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提出了“民主政治”与“近代教育”的相关言论。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代表,他提倡个人的独立自主,认为要“认真探讨现实法律保障的个人自由;同时主要以欧洲文化的‘个人’观为中心展开启蒙活动”(严绍璁等,1996:434)。此外,特别强调“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等西方民权思想,他认为:

“我国人民缺乏气力的根源,须知数千百年来,全国权柄尽归政府一手掌控。自武备学问至工商百业,纵是人间琐碎事务,亦无不由政府干预。人民唯知循政府驱使而奔忙,恰似国家沦为政府私产,而人民形同寄食国中的宾客。

.....

因此可以说:若民众缺乏独立精神,则所谓的文明建设不仅徒具形式沦为无用的摆设,反而只能使民心日益萎缩。”

(庆应义塾,1969:59-60)

可见,福泽谕吉主张将“个人意识”从中央集权中解放出来,民众的“独立精神”是“文明建设”的基础也是后续发展的动力。这种“个人意识论”与他的教育理念相互贯通。他表示“人生来没有贫富贵贱之分,只是勤于学问而博学广知之人会成为贵人、富人,没有学问之人则变成下人、穷人”(庆应义塾,1969:30)。人生而平等,没有谁一出生就应该被要求成为什么人、去做什么事,真正的区别在于后天是否接受了教育。

很显然,犬田文学中表现出的农民状态与此大相径庭。既然福泽谕吉说的是“国民精神”,那么“国民”之中必定包含日本农村地区。如前文的分析,日本农村地区始终难以跳脱出“锁国性”思想与“家”制度的羁绊。在与“土地”“家”的病态关系中,人已经趋于丧失了主观能动性,所有的东西从出生起就已被命定好,一切均是为了“家”的永续而存在。为了保证“家”的体系平稳运行,所有想要学习新知识、试图靠近近代文明的行为都被视为“异端”。正因如此,犬田主张以“文学”为手段,通过对农村文化的重构来唤起千百年来被压迫的农民,使其脱离奴隶根性,具备自我意识。犬田曾在《土的艺术的发生和其意义》一文中指出:“新文化建设迫在眉睫,换句话说,当下正迫切要求从现代文化的土壤中重新创造。引领我们生活的文学,此刻也必须重返根本立场——立足土地的立场,为当代社会生活树立路标”(犬田卯,1929:2-3)。犬田的“文化重构主张”强烈呼应了其作品表达出的“反传统”倾向——努力唤醒麻木的农民,立足土地创造“新文化”。凸显出彼时日本农村难以开化、无法脱离腐朽思想束缚的事实,同时也暗藏着作家对资本主义压迫农村、利己发展的不满。

西化风潮下的日本似乎已经加入了“文明国”的行列,但被忽略的繁荣表象下的农村现实,给日本近代化的真实性打上了一个问号。尽管福泽谕吉不断从思想层面为日本“脱亚入欧”做铺垫,甚至断言“日本国民精神已经完成西化”,但通过犬田文学中的表现出的农民思想状态与其对“新文化”创立的主张可以发现,彼时的日本农村仍处于未完全开化的“半野蛮”状态。不可否认从经济表象来看,日本在1910年前后便已经跻身工业国行列,但背后暗藏的城乡经济发展失调以及农村封建思想的延续,使其无法达到福泽谕吉所说的“文明国”的标准。换言之,不管是在经济还是思想文化层面,日本均没有完全实现“脱亚入欧”。这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难以忽视的历史实态,也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

4 结 语

犬田卯以自身体验为基础,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刻画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农村的真实映像。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日本举国向“近代化”奋力迈进之际,农村被置于社会再生产环节的最底层,为资本主义生产做了嫁衣,城乡分化急剧加深。同时,生产力的落后使得农村的整体意识形态难以开化,在“锁国性”和“家”制度思想的牵制下,农民难以脱离封建体制下的思维定式,这直接影响了其对“新文化”的接受,以致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对此,犬田通过自身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加以客观冷静的描画,并将自身对土地、农村、都市和近代化的认知,或清晰或隐蔽地糅合进去,为地处边缘的农民文学发声。他的农民文学强调农民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脱离腐朽守旧的农村传统,重新认识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土”的本质,以“大地”为根基创造出“土的艺术”,并希望以此作为农民的思想指引,努力走出千百年来被压迫的困境,实现“新生”。如此水深火热中的农民,使得福泽谕吉“国民精神早已向西方文明完成了移植”的定论难以立足。一国社会形态是“文明”还是“野蛮”,并非只是只凭

经济数值可以判定的;“近代化”的标准也并非只决定于“工业化”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要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系统一起来去把握。换言之,要以生产力为根本,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思想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加以辨别,来做出更加客观、真实的判断。犬田不仅对农民、农村、农业有着第一视角下的实际体验,对日本近代化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使得他的农民文学呈现出对农民、农村、农业的自我反省,也呈现出对近代化表象背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合理性的客观揭露。从这个意义上讲,犬田卯的农民文学是批判与自我批判共存的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映照。

犬田卯的农民文学也为日本文学研究赋予了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不仅是对日本文学史的重要补充,也为日本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犬田农民文学的时代性、阶级性与现实性,反映了其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密切关联。因此,研究犬田农民文学,不仅关乎文学本身,更是一种结合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性考察。其作品中所展现的“土地”与“农民”“都市”与“农村”不仅客观呈现了彼时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样貌,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日本“近代化”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注

- [1] 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将农民文学定义为:“试图从农民主体立场出发表现农民生活现实的自觉意识”的文学。日本国语大辞典中的定义为“扎根于农村风土与生活体验,从农民独特立场展开主题的文学。”犬田本人在论著《农民文学入门》中认为:判断是否为农民文学的标准不是作品是否以农村·农民生活为题材,而是作者的态度、观点是否从生产农民的立场出发。由此可见,学界的定义所强调的“农民立场”与犬田卯的观点基本一致。关于农民文学的概念梳理与界定较为复杂,笔者将另文论述,在此,暂且以犬田对农民文学的界定为犬田农民文学研究的原点。
- [2] 该作品为一部短篇小说,描写了赘婿农民“友吉”软弱无能,被国家制度洗脑,最后失去生活指望,自杀身亡的故事。
- [3] 该作品为一部短篇小说,描写了佃农与地主之间的复杂关系。表现主人公“作二”从麻木不仁到觉醒反抗的思想转变。
- [4] 该作品为一部中篇小说,描写了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裹挟下的佃农“定作”一家人的生活形态。表现出农民与地主、都市、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力量关系。
- [5] 佃农仍按之前的规定继续缴纳实物地租。
- [6] 『土にあえぐ』『土にひそむ』『土に生れて』被称为犬田卯的长篇“土”的三部曲,描写了以作家自身为原型的主人公良一的成长历程。展现了农村与都市资本主义间的矛盾、农村生活的真实相貌。表达了对农村腐朽、守旧的批判与通过文学手段唤醒农民“自我意识”的希望。
- [7] 为了保障年贡米的生产,幕府和各藩还对作物的种类进行了限制。在征收年贡的方针上,幕府与各藩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年贡的征收量要恰到好处,让乡村百姓半死不活”。为使农民能像《庆安御触书》所设想的那样进行彻底的劳作,幕府规定了公休日,有的地方还规定一天只能抽四次烟。肥后熊本藩到了正月翻地时节,天还没亮村吏便会敲鼓叫起村民,不起床者将受到村吏的警告。如果翻地不及时延迟到二月,则要受到处罚。三月末,郡代会视察各村,偷懒者将被投入大牢。
- [8] 父权家长制,顾名思义就是父亲在家族与家庭中的绝对统治权。在人类历史上,父权家长制是随着个体家庭的出现而产生的,是伴随着生产力发展,男女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结果。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与家庭作为社会细胞而存在,为统驭一家起见,家长权具有重大意义。
- [9] 为显示其法律的近代性,在民法的条文中,不再使用“家长”这一字眼,而沿袭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法律、政令中的“户主”这个概念。实际上,户主与家长完全是一回事。

参考文献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北岛正元.江户时代[M].米彦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
- 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M].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严绍璦,源了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 思想卷[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 李卓.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杨栋梁.日本近现代经济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 周启乾. 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
- 鹤见俊辅.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M]. 邱振瑞, 译.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
- 川島武宜. 川島武宜著作集: 第10卷[M]. 東京: 岩波書店, 1983.
- 犬田卯. 土にひそむ[M]. 東京: 不二屋書房, 1935.
- 犬田卯. 土に生く[M]//鶴田知也, 山本勝治, 前田河広一郎, 等. 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集: 11 「文芸戦線」作家集2. 東京: 新日本出版社, 1985.
- 犬田卯. 土に生れて[M]. 東京: 平凡社, 1926.
- 犬田卯. 都市と農村[M]//犬田卯. 土の芸術と土の生活: 農民文芸論集. 東京: 農民文学社, 1929.
- 犬田卯. 土の芸術の発生と其の意義[M]//犬田卯. 土の芸術と土の生活: 農民文芸論集. 東京: 農民文学社, 1929.
- 犬田卯. 解放された農奴[M]//鶴田知也, 山本勝治, 前田河広一郎, 等. 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集: 11 「文芸戦線」作家集2. 東京: 新日本出版社, 1985.
- 犬田卯. 黙せる魂[M]//鶴田知也, 山本勝治, 前田河広一郎, 等. 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集: 11 「文芸戦線」作家集2. 東京: 新日本出版社, 1985.
- 田中彰. 未完の明治維新[M]. 東京: 三省堂, 1974.
- 司法省調査課. 司法資料第180号徳川禁令考: 第五帙[M]. 東京: 司法省調査課, 1932-1934.
- 司法省調査課. 司法資料第180号徳川禁令考: 第四帙[M]. 東京: 司法省調査課, 1932-1934.
- 明治三十一年民法[M]//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 第5巻. 東京: ドメス, 1976.
- 高橋亀吉. 日本農村経済の研究[M]. 東京: 先進社, 1930.
- 高橋亀吉. 明治大正産業発達史[M]. 東京: 改造社, 1929.
- 富田正文, 土橋俊一. 福沢諭吉選集: 第7巻[M]. 東京: 岩波書店, 1981.
- 暉峻衆三. 日本農業史[M]. 東京: 有斐閣, 1988.
- 慶応義塾. 福沢諭吉全集: 第3巻[M]. 2版. 東京: 岩波書店, 1969.

作者简介: 王硕 男 满族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日本近现代文学、中日比较文学

联系方式: E-mail: 739801010@qq.com

Inuta Shigeru's Peasant Literature and Japan's Modernization

WANG Shuo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Japan's modernization, peasant literature examined the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s brought about by social change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yet it did not receive the attention it deserved. The peasant literature of Shigeru Inuta broke through the established paradigm of pastoral literature. Employing realist techniques within a historical framework, it portrayed the true conditions of Japanese rural societ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tearing away the facade of Japa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exposing the urban-rural opposition concealed beneath the surface of modernization. The author argued that the countryside, under the immense dispa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uld not achieve healthy development. The Japanes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suppressed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peasants, making it persistently difficult for them to establish self-consciousness. Through literature, the author attempted to reconstruct rural culture.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ational core of Inuta's peasant literary thought. It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traditional rural ideology reflected in his work, clarifies the dual factors leading to urban-rural differentiation, and exposes the historical flaws accumulated in the process of Japan's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Keywords: Shigeru Inuta; Peasant Literature; Countryside; City;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李广悦)